

探索文學史的敘述學

◎ 吳曉東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錢理群的近著《1948：天地玄黃》在寫作上表現出對文學史的理論、觀念、方法以及文學史的敘述體例和敘述形式的自覺探索。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正是午夜時分，歷史剛剛進入1948年。北京大學教授、詩人馮至突然從夢中醒來，在萬籟俱寂中，聽到鄰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聲音時而激烈，時而緩和，直到天色朦朧發亮，才漸漸平息下去。馮至卻怎麼也睡不著了，他想：這聲音在冬夜裡也許到處都是吧。只是人們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罷了。但是，人們不正是可以從這聲音裡「感到一個生存者是怎樣孤寂地在貧寒的冬夜裡掙扎」嗎？——詩人想了很多，很久。

這段敘述看似平淡，卻是作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殫精竭慮選擇的結果。在本書的具體寫作中，最困難的可能正是這段開頭，它不僅要奠定書的基本調子，統攝與提示整部書的敘述流程，同時還應該體現作者對於一種可能的文學史的敘述學的追求。這段開頭值得重視的，首先在於它在文學史寫作形式上的試驗意義。它為讀者引入了一個以第三人稱出現的歷史敘述者的視點，這個第三人稱的敘述者正是作者的化身，但通過第三人稱敘述者的選擇，作者的聲音卻可以含而不露，「敘述」的意義從而凸現了出來。這頗有點像小說或報告文學的寫作，其敘述化的語境迅速地將讀者引入歷史的情境，使讀者感同身受般地置身於一種過去的現場之中。

敘述化的語境的鮮明美學特徵，在於它體現了文學史敘述的具體性和細節性。作為一個文學史家，錢理群的敏感和稟賦體現在他很少發純玄理性的議論，而往往從文學史實、事件和具體文本出發，從具體的歷史細節以及文學史細節中引出問題，從典型現象的詩意描述中生發概括。這種文學史研究與敘述的具體性、形象性，表明了文學史的敘述至少應和其他的歷史敘述有所區別，有其無法替代的文學性特徵。而其中最本質的支撐是文學史敘述對文學歷史情境的具體呈露，是對提示一個時代的內在意蘊的「瞬間顯現」的歷史細節的穎悟，正如作者在如下一段文字所提示的：

我至今也還記得我的一段閱讀經驗。在旅途中隨便翻閱一本抗戰時期一位美國醫生寫的見聞錄，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個細節：在戰火紛飛之中一個農人依舊執犁耕田，戰火平息後，周圍的一切全被毀滅，只有這執犁的農人依舊存在。我立刻意識到，這正是我要努力尋找的，能夠照亮一個時代的「歷史細節」：在這「瞬間永恆」裡蘊涵著豐富的歷史內容（多義的象徵性）同時又具有極其鮮明、生動的歷史具體性。

對歷史的具體性和細節性的關注，追求一種回到歷史「設身處地」的現場感，還表現了錢理

群對文學歷史的偶發性、特異性和原生味的執迷。隱含在這種執迷背後的，是一種文學觀以及一種歷史觀。如果說，在錢理群和他的兩位友人於80年代所倡導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論框架中，還留有歷史進化論和歷史決定論觀念的影子，相信新比舊要好，未來勝於過去，相信歷史是沿著某種既定的觀念、目標（「本質」、「必然規律」）一路凱歌行進，即使有一時之曲折，也阻擋不住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那麼，在9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對歷史理性、本質規律、美好未來諸種範疇的虔信已成為了破碎的神話。錢理群的文學史觀念也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轉換。這體現在對黑格爾式的歷史決定論的摒棄，對歷史規律性和必然性的懷疑，對歷史宏觀敘事的合法性的疑問。當人們關注規律、本質，關注歷史的大敘事的同時，歷史的那些獨一無二的具體性和偶然性以及不連續性就可能被忽視甚至漠視了，其結果是對歷史複雜圖景的「淨化」和「簡約」。錢理群強調「典型現象」和「歷史細節」的深層的動機，正在於「要恢復那些能夠顯示文學發展的偶然性、個別性、特殊性的文學現象（細節）在文學史描述中的地位，而且提醒人們，在勾勒歷史發展中的人的生命流動軌跡時，不要忽視軌跡圖像之外、未能包容的生命（文學）現象，極其孕育的生命流動的另一個方向、文學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對所謂「偶然性、個別性、特殊性」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必然與文學史敘述對歸納、線索、概括的內在要求發生矛盾與衝突。文學史中畢竟有「史」的維度，因此，如何處理文學性的因素與史的因素，是任何一個文學史家都無法迴避的課題。錢理群平衡這兩個維度的具體方法是對文學史中「單位意象」、「單位觀念」等「典型現象」的抽繹和提煉，這是錢理群文學史方法論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典型現象」的提煉使文學史敘述既從豐富而具體的文學史細節中來，同時又不至於迷失在紛紜複雜的文學史現象中，最終表現出一種史家所具有的超越和概括的意向。

這使錢理群的文學史理論表現出一種系統性和可操作性。但在錢理群的文學史觀念中仍無法祛除偶發性與概括性的悖論，這種悖論從根本上說來自於「歷史」本身，這就是「史」的範疇中對規律、本質、整合的固有追求，與歷史本身的無序性、偶然性之間的先在的矛盾。錢理群追求的文學敘述學也涵容了這種矛盾。他強調的「典型現象」的範疇儘管以其「歷史細節」涵容了豐富而初始的文學性，但它依舊是一種抽繹、歸納與概括。它本身就有無法克服的悖論性。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典型現象」之所以是一個內蘊豐富的、可生長性的文學史範疇，正因為它與悖論的內在絞結的關係。可以說，它向人在歷史中的生存困境以及歷史情境本身的複雜面貌保持了一種開放性。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文學史著作中虛擬的敘述如何在呈示一種過去的現場感的同時，也把歷史情境本身的複雜性、未知性和不可索解的語境氛圍傳達給讀者，或者說把文學歷史本身的困境以及文學史家的困境呈現出來。這恐怕也是文學史敘述學的重要維度，它要求著作中虛擬的歷史敘述者可能要調整全知全能的姿態，兼用一種限制的視點。限制的視點本身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真正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更不可能把握歷史的全部真相。任何視點都是有限度的，有盲點的。而文學史敘述的課題之所以有著豐富的理論生長點，是因為它不僅是純粹的敘述問題，更是歷史觀的問題。如何敘述歷史，其實就是如何認識歷史和如何建構歷史，歷史其實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被敘述出來的。換句話說，本來沒有本真的歷史，是當我們把它敘述出來之後它才存在的。在錢理群的文學史觀念中，仍有一種追求歷史的本真性的執著，即相信有那麼一種真實的歷史存在。這就意味著，他在確立了懷疑主義的基本立場，打破了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歷史觀之後，仍有其最後的支撐，那就是對本真歷史存在的信仰。因此，構成錢理群文學史觀念的底座的，仍有其信仰主義以及人本傾向的一面。對作者所代

表的那一代人來說，假如不相信歷史本身的真實性，不相信人性是一個實存的範疇，是無法生存下去的。而回到現場，設身處地，也都意味著有那麼一個現場可回，有那麼一種真實的歷史時空和情境可以去共感。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錢理群的文學史理論框架中允許虛構的與建構的成分，也是技術性與策略性的，不但不會破壞歷史的「本體」，反而可能有助於凸現這個本體。對本真的歷史以及人性的存在的虔信，構成了錢理群這一代人難能可貴也是無法替代的財富。然而，歷史可能還有另一副面孔，這另一種歷史存在的方式，也在翹首等待著它的敘述者。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總第五十二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